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根基

张薇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中国

【摘要】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以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智慧之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智慧硕果。与西方宣扬的绝对化的“普世价值”完全不同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中华文化天下本位的价值主体、尚中贵和的价值思维和多元并存的价值态度，站在全球发展、人类共存的视野上倡导世界人民共同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抵御全球风险挑战、破解人类现代化难题。新时代，全人类共同价值所体现的中华文化愈加彰显，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根基，对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国际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1. 引言

在当下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差别性现代化导致的矛盾冲突不断，全人类价值的突出作用不断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明之争，其本质和内涵深深扎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和精神传承。从天下本位到全人类，从和谐、平衡、中庸之道到和平、稳定、繁荣的追求，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对人类和平、正义、公平、友善等诸多价值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挖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文化根基，为推动全球合作、增进人民福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文化指引。

2.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回应，也是对西方“普世价值”话语体系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对立或者替代，而是从哲学根基、价值取向到实践路径的系统性突破，这种超越并非否定个体价值或者自由追求，而是突破单一文明的话语霸权，在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中凝聚共识，为人类应对共同挑战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价值框架。

西方“普世价值”表层包含着同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相似内容的“价值共识”，打着文明优越的幌子试图强迫其他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大肆干涉其内政。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种种行为都在展示着西方国家对其他非西方国家或者地区内部

政治经济的插手和操控。然而，这种“普世价值”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生存之道。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走向衰败的趋势。斯宾格勒也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中通过抽象的、思辨的对文化生长规律的考察，断言西方社会正趋向没落。这是从文化视角对西方资本主义前途的预言。与此同时，这种主张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普世价值”与现实西方文明步入衰落趋势极为不符，因此承认不同文明的平等地位对主张“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来讲难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文明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不同文明各具特色，绝无优劣高下，要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要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还要重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和不同文化价值理念的一致性。

普世价值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界定的价值观，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其中普世价值所表现出的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所谓共同属性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内容只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关系服务的。邓小平在关于“人权”的问题上给出了回答：“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权利，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的‘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真正使所有人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

没有真正的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来干涉别国内政，侵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权利。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全面，其中的“和平与发展”就是关于人类生存权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当今世界仍有部分地区战火纷争不断被挑起，因此，和平仍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要坚决摒弃以西方价值观为蓝本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霸权的“普世价值”，警惕西方借“普世价值”之名行霸权之实，同时要在交流互鉴中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真正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

3.全人类共同价值赓续的中华文化血脉

3.1 立足天下本位的价值主体

中华民族很早就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天下观，侧重于把和谐共生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追求，始终倡导在更大的范围内找平衡，求共存，立足天下本位谋共同利益，求普遍福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传统天下观是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标识。“天下”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地理意义上的“天下”，对应的是“大一统”疆域，是《诗经》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对应的是化民成俗，是《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概念。而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还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天下”指的是中国范围内的疆域，广义的“天下”是指全世界的范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站在全人类高度的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因此，所讨论的对象主要是指广义的天下观。

空间与伦理的统一、责任主体的无界性、共生而非征服的秩序观是万物一体的宇宙秩序，充分表达了“天下本位”的哲学内涵，是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的全人类价值主体相符合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的。”[1]赵汀阳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

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2]，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优越性是“无外”，即在中国的文化中，没有异教徒，没有假想敌，即使有“异族”，我们也认为是可以教化的，因而没有永远的敌人。“天下本位”的现代转化超越民族国家叙事的困境，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为构建共同责任提供文化资源。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大道不孤”化用自《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3]和《论语》“德不孤，必有邻”[4]，将“天下”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场域，超越了血缘、地缘的局限。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经历了一年来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典强调，只要我们始终秉持“和为贵”“人人为公”的“人间正道”，就能“四海之内皆兄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天下本位”不是复古幻想，而是一种向世界敞开的文明方法论。它既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分裂性，又通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东方智慧，为人类应对全球化危机提供了价值坐标系。这种将全人类纳入共同伦理框架的尝试，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对“人类如何共存”这一终极命题的深刻回答。

3.2 继承尚中贵和的价值思维

尚中贵和是贯穿于《论语》中的价值思维，孔子主张以和为贵、和而不同，这其中体现出尚中贵和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向来追求和平发展，“和”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凝练表达。儒家倡导“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认为要把礼真正的在行为中施行，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和谐为可贵；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凸显了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在回答人们全部相爱、交互得利应该怎么做时，子墨子言：“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墨子·兼爱中》）。“和”不仅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国际交往的应然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全人类共同价值首要强调的就是和平，这也秉持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尚中贵和的价值思维，中国人民仍然坚持和平发展，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增添鲜明的底色。尽管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尚中贵和的价值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都强调和谐、平衡和社会的稳定，都关注人类的福祉和发展，尚中贵和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实际上是多种不同要素的平衡，这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要表达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各国处在相互制衡、相互合作的状态之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意义。当前国际局势仍然不稳定，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欺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挑战，破解人类现代化难题做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智慧。

“尚中贵和”不是静态的传统教条，而是流动的文明基因。在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今天，这一思维为人类提供了超越“非此即彼”困境的文化工具箱。在方法论上，以“执两用中”破解零和博弈；价值论上，以“和实生物”重构文明多样性；本体论上，以“致中和”重塑天人关系。正如张岱年所言：“中国哲学中的中和观念，可以成为医治现代社会病的良方。”当人类站在文明转折的十字路口，重新激活“尚中贵和”的智慧，或许能开辟一条既守护差异、又通向共善的“人类新中道”。

3.3 秉持多元并存的价值态度

中国古人不仅讲求尚中贵和，还追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秉持多元并存价值态度的理念先导。“和”强调的是和谐、和睦、协调、融合，它追求的是在差异中达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状态，“不同”则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是天下之义的理念缩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推己及人，以此拓展到天下之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秉持包容和合，以达天下之和。“和而不同”意味着承认并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和个体的独特性，倡导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寻求相互间的和谐共处与合作。它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统一。

“和而不同”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首先，“和而不同”是“协和万邦”的重要基础。“和而不同”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种理念使得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能够和谐共处，为“协和万邦”所追求的国家间的和平、友好、合作提供了前提条件。只有秉持“和而不同”，才能在多元的世界中实现广泛的和谐，进而达成“协和万邦”的目标。其次，“协和万邦”是“和而不同”在国家关系层面的拓展和体现。“和而不同”主要侧重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而“协和万邦”则将这种和谐理念延伸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强调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最后，两者共同反映了中国传统智慧中对于和谐、和平、合作的追求，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看待世界的重要理念，对于促进国际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中的“协和万邦”的天下观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演变成为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互鉴，既重视倡导文化多样性，又要在各民族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文化的共同进步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胸怀大局”的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始终秉持着“兼收并蓄”“多元平衡”的文化发展模式。协和万邦的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一脉相承，是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的价值愿景与和谐万邦的理想之光。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但确定唯一的是人类前途命运休戚与共、前所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是将中国传统“尚中贵和”的价值态度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发展自己的同时造福世界和全人类，始终认为所有国家要共同抵抗全球出现的最新挑战和风险，为全人类的生存创造长久的安全保障。

4.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中华文化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无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与西方和美国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还是其他国家遭遇发展中的困境甚至是持续战

火纷争的胶着状态,都是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景目标目前还难以实现。面临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中国更要意识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弘扬中华文化。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文明交流互鉴的内涵外延不断拓展,文明对话会多次在国际上召开,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广泛开展,促进了各国友好人士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入理解,激起了众多国家对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的深刻共鸣。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一个深度交互的过程,既有对其他文明之长的接收与吸纳,也有对自身文明之美的传播与分享。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同其他民族的对话与交流跨越山海、绵亘古今。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通过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实现自我更新。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文明,也乐于向世界贡献中华文明的成果。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也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而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正式以其开放包容的基因与海纳百川的气度,为人类文明对话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and 实践典范。这种交流互鉴并非简单的文化元素叠加,而是通过“和而不同”的智慧实现文明能量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智慧,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动态生命力的源泉。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深刻洞察,而中华文化作为延续五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体系,其思想精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存在着深层的文化基因共振。这种文化根基不仅存在于典籍文献之中,更渗透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与实践智慧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底蕴深厚,坚持中华文化天下本位的价值主体、创新尚中贵和的价值思维、秉持多元并存的价值态度,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增添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底色。中国一

方面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树立“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信。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远景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追求是统一的。中国有拒绝别国文明强行改造的权利,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立性,也不可能强硬取代、排斥其他文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优点不是区别对待其他民族文化的理由,文化各有优势和发展空间,要坚持在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学习和借鉴其他优秀的外来文化。西方文明确实存在缺陷,但是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错误的。中西方的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于西方国家试图对中国施行全盘西化必须要坚决抵制,但是,却不能否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中华文化也需要吸收借鉴其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才是“海纳百川”的真正意蕴所在。

中华文化的价值根基并非封闭的遗产,而是始终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焕发新生。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倡议,中华文化正以其“古老的智慧”参与重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对全人类价值的根本性贡献——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传统中开创新机。

参考文献

- [1]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2]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3]孔颖达,等.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4]何晏,等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5]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